董明道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刘瑞忍

摘　要　董明道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致力于宣扬图书馆价值与理念,探索图书馆组织与经营法,在图书馆学研究方面有所建树。他热爱图书馆事业,长期主持南开大学图书馆、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北京矿业学院图书馆工作,敦本务实,治馆有方,在馆藏建设、目录编制、读者服务、图书馆管理等方面成绩卓著,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参考文献52。

关键词　董明道　图书馆学家　南开大学图书馆　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

Dong Mingdao's Contribution to China's Librarianship

Liu Ruiren

Abstract: Mr. Dong Mingdao is a well-known expert in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He applied himself to promoting the value and concept of library and exploring the methods of library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He scored an achievement in the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In addition, he devoted all his life to the library work and was in charge of Nankai University Library,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Library and Beijing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Library for a long time. He is pragmatic and well-managed. He has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collection building, catalogue compilation, reader service and library management. In a word, he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 in China. 52 refs.

Keywords: Dong Mingdao; Library Scholar; Nankai University Library;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Library

董明道(1902—1986),字垂照,江西九江人。1924年9月入文华大学图书科就读[1],1926年6月获华中大学文学士学位,毕业后任沪江大学图书馆馆员[2],1928年任安徽省立图书馆编藏股主任。1931年5月,董明道应北平友人之邀,辞职赴北平任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编目职[3]。11月,改任南开大学图书馆主任[4],并兼任南开大学副教授,讲授图书馆学。1937年12月,被西南联合大学(下文简称"西南联大")聘请为图书馆副主任,襄助图书馆主任严文郁办理馆务[5](79-80)。1943年2月,严文郁辞职,西南联大改聘董明道为图书馆主任[5](271-273)。1946年7月,西南联大完成使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员北返,董明道继续担任南开大学图书馆主任。

1953年1月至1957年,董明道任北京矿业学院①图书馆主任[6](163)。1957年11月,北京矿业学院成立图书馆委员会,董明道担任副主任委员[6](72)。1959年,调往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工作[7]。

董明道热爱图书馆事业,长期主持南开大学图书馆、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和北京矿业学院图书馆工作,敦本务实,治馆有方,在馆藏建设、目录编制、读者服务、图书馆管理等方面成绩卓著,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目前学界尚无专文探讨其图书馆生涯、著述或贡献。为此,笔者广泛查考史料,以期能填补图书馆学人研究的些许空白。

1　专业探索:开展图书馆学研究

董明道自1928年担任安徽省立图书馆编藏

① 1953年9月,中国矿业学院迁往北京,更名为北京矿业学院。

DOI: 10.13666/j.cnki.jnlc.2020.0111

股主任以后,积极进行图书馆学研究,在《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安徽省立图书馆季刊》《学风》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其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与认可,《图书馆学季刊》曾专门介绍他的《图书选择原理略说》[8]。

1.1 宣扬图书馆价值与理念

董明道十分重视图书馆的宣传工作,曾著《今日之南大图书馆》[9]等,翻译《西班牙国立图书馆》[10],介绍国内外图书馆概况,以引起民众的关注和兴趣。他认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尚处萌芽时期,一般民众对于图书馆的职责多不了解,所以特著《图书馆的任务》系统阐述图书馆的主要职责。董明道认为图书馆是一种社会文化事业,肩负着"阐扬文化、介绍学术、宣扬党义、辅助国民教育、增进民众道德、供给娱乐读物"的重任,可使文化更兴盛,教育更普及,国家社会更进步;同时他对图书馆事业给予高度的期许,主张"凡对社会民众有利益于文化有关系之事,无不应在可能范围内,为社会民众举办",如学术讲演会、读书会、演放电影、职业指导等[11]。

董明道特别关注儿童图书馆发展,1929 年著《儿童图书馆在教育上之价值》,宣扬儿童图书馆在教育上的重要作用:儿童图书馆能增加儿童课外生活的兴趣,养成儿童读书的习惯,增加儿童自动求学的能力,培养儿童使用参考书的能力,辅助学校教育发展儿童的才能,培养儿童的公德心,陶冶儿童优美的性情[12]。他从儿童的心理与认知出发,不唯知识论,而是侧重探讨儿童图书馆在阅读兴趣、学习能力、品行情操等方面的功用,强调儿童图书馆在儿童教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价值,提倡儿童图书馆单独设立、逐步扩充。其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先进性。

董明道的现代图书馆理念集中体现在《现代公共图书馆之特征》中。厘清现代图书馆的基本特征,明确现代图书馆的发展趋势,可以更好地组织与管理图书馆。现代图书馆不同于传统的藏书楼,不仅要注重收藏与保存,而且要注重流通与利用。他认为现代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事业之一,民众皆得享受其利。首先要免费、自由,对阅者不收费,不加以其他限制。无论贫富贵贱,人人皆可自由地来图书馆,寻求他喜欢读的书籍,一切设施与服务要谋读者之自由与便利。其次要平等、开放,读者范围扩大,购置图书不可重彼轻此,各类图书要均衡增加。开放书库,使读者可以随意取阅[13]。董明道准确地概括出了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特征,积极为公共图书馆事业鼓与呼,推动了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理论、制度、观念的日渐深入人心,促进了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董明道还指出,现代图书馆在服务上应谋求读者与图书的结合,如:设置参考部解答民众的一切询问;利用广告与宣传引起民众的阅读兴趣,加强图书馆与学校的联络;用种种方法为读者提供便利,如附设食堂和文具店,以低廉的价格售给读者;购备雨具,供读者不时之需等等[13]。这些图书馆服务理念科学适用,董明道将其用于指导具体的图书馆管理工作。

1.2 探索图书馆组织与经营法

1920 年代,我国儿童图书馆事业兴起,图书馆界的先驱们开始思考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儿童图书馆。"因为儿童图书馆是一宗新事业。凡是一件新的事,起初的时候,必感觉无限的困难。因为一切都没基础,没有成例,所以处处要自己去创造、去试验。"[14]董明道的《最简单的儿童图书馆之经营法》即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其经营法不因规模小而因陋就简,失去专业性;也不因工作繁琐而故作高深,缺乏实用性。它符合国情,如书架大约备二十个即可,分类法要简明且富有伸缩性,组织要简单,可设主任一人,管理员一人等;它具体而不失专业,如阅览椅用靠背式,不用扶手和脚踏,主任要受过图书馆学训练等。文章从经费、建筑及设备、组织、儿童用书、儿童图书的分类、儿童图书馆的编目、儿童图书馆的特色、儿童图书馆的经营者八个方面,介绍了如何组织与管理一个小型的儿童图书馆[15]。该文数据翔实,所列出的经费分配比例切合实际,书架、阅览桌

椅、目录柜和出纳台的规格尺寸符合儿童的年龄特征，涵盖了儿童图书馆的绝大部分工作，操作性强，是小型儿童图书馆经营与管理的指南。

刘国钧认为，“所谓出纳，就是指阅览图书时，依一定的规则借贷和归还图书的方法。所以出纳是图书馆很重要的任务。图书馆能否在社会上发生影响全在出纳是否得法”[16]。1930年，董明道著《图书出纳法略说》，他先略陈出纳法的演进过程，分析簿记法、木板法、签条法、卡片法的利弊，然后详细介绍了安徽省立图书馆实行的出纳法：对当时极通行的卡片出纳法进行了改进，如改每册书制一书片为每部制一书片，书片上加入卷数与册数；取消书片袋，书片依分类次序排列于出纳处旁的书片柜[17]。文章题目名为略说，实则内容详尽，从填写借书证保单、办理借书证、明了借书规约到借还手续无一不备。安徽省立图书馆的出纳法符合简捷、正确、便利的出纳原则，为图书出纳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对于图书选择，董明道亦有自己的见解。1931年董明道发表的《图书选择原理略说》指出：图书馆选择书籍要兼顾书籍、图书馆、阅者三方面，应注意书籍本身的价值、对阅者的影响、著者的经历、思想和著书目的等，还应根据图书馆的性质和购书经费而定，适于阅者的需要和程度[18]。董明道从实践出发，辩证地分析书籍的版本选择、书籍价值与阅者兴趣之间的平衡问题，对图书选择具有指导意义。

1.3 讲授图书馆学课程

董明道讲授图书馆学课程，为学生学习图书馆学打开方便之门。1930年11月，安徽省教育厅鉴于本省图书馆事业尚不发达，各学校图书馆管理乏人，特开办图书馆专班，由省立第一中等职业学校代办[19]。董明道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毕业生刘华锦、安徽大学文学院讲师鲍哲文担任教员。此次图书馆专班共招收学生33人，均系高中毕业或旧制中学毕业后曾在图书馆工作两年者。图书馆专班的课程设置合理，尤重实践，每周的实习时间，占全部课时的三分之一[20]。经过六个月的专业训练，图书馆专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成果，顺利毕业的30名学生“极适于学校图书馆管理与各县图书馆经营”[21]。董明道等人为安徽省图书馆事业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其中的佼佼者包括服务于安徽省立图书馆后来成为目录学家的霍怀恕，任职于安徽省立图书馆和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的汪荫祖，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庆女子中学图书馆的张志道等。

此外，董明道任职南开大学期间还兼任副教授[22](180-181)，传授图书馆学、目录学、图书利用法等专业知识；任职西南联大时兼任联大师范学院教育学系副教授，继续从事图书馆学教学工作[23]。董明道长期在大学开设图书馆学课程，对学生进行图书馆学启蒙教育，传播先进的图书馆理念，促进图书馆学知识的普及，为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敦本务实：编制图书馆目录

图书馆目录，又称馆藏目录，是揭示、识别、检索馆藏文献的工具，是读者开启图书馆知识宝库的钥匙。董明道对于编目素有研究，一直致力于完善图书分类体系和编制馆藏目录索引。1929年曾著《本馆编目法及其说明》，介绍安徽省立图书馆所编的簿式目录和片式目录。片式目录又分为书名、种类、著者、书架等多种，董明道详解七种目录片的著录事项和著录格式，叙述详明，附有图例。无论何书均可照格式编制，便于他馆参考[24]。

1930年2月，陈东原就任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后，积极整顿馆务，整理旧书，添置新书。馆藏书籍日渐增多，故由编藏股主任董明道负责主持编纂《安徽省立图书馆中文书目》。1930至1932年间，该书目分六册陆续出版，董明道主编社会科学类、总丛经典类及哲学宗教类、语言文学类三册，他离职后由刘华锦等编就。董明道的分类方法，大类采用《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只是为了一以贯之，将语言与文学合置于400文学类；为了容纳浩繁的中国地理类图书，将地理游记由史地类

中析出自成一类为 800 地理类;同时细目循用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又参酌四库类目增删修改[25]。董明道的分类方法兼容并蓄,对于中文新旧图书都能很好地适用,是杜法的本土化改革和刘法的灵活运用。

1923 年 8 月,文华大学图书馆专科毕业生王文山任南开大学图书馆主任,将中西文图书三万余册全部编目,并于 1925 年印行《南开大学图书馆中西图书目录合编》一卷,附索引、新旧杂志一览表、报章一览表。王文山离职后,新入藏图书多未能分类编目,致失其效用。为了便于应用,1931 年 11 月董明道到任后,加强图书分类编目工作:中文旧书仍沿用四部分类法,中日文新书与西文书采用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并加以修订;目录卡片著录更加详尽,每张均注明作者、书名、版本、出版期、卷数或页数、开本等;除著者索引、书名索引外,又增加了分类目录。

1927 年,天津名宿卢木斋捐资十万,兴建南开大学图书馆,次年新馆落成后又慨捐书籍三万余卷。1930 年 3 月,天津著名藏书家李典臣捐赠古书七万五千余卷。然二者皆未整理编目,董明道执掌南开大学图书馆后,主持十余万卷中文旧书的整理编目工作。1933 年秋,董明道先是请得校长张伯苓同意,拨款整理该项图书。10 月底,又从国立北平图书馆聘请范腾瑞来馆整理。范腾瑞精于版本目录学,他把零散部分完全配合整齐,所编目录门类清晰,版本详明[9]。1935 年,馆藏旧书分类编目完竣,将李典臣 73,902 册赠书装套编号,陈列于书库,并编成书本目录两册[26](967-968)。

在担任北京矿业学院图书馆主任期间,董明道积极补充矿业特色文献,主持编纂多种馆藏目录。仅 1956 至 1957 年间,该馆就先后出版了《北京矿业学院期刊目录》《北京矿业学院俄文图书目录》《北京矿业学院中文图书目录》《北京矿业学院西文图书目录》《北京矿业学院新编图书目录》等。

另外,董明道注重目录卡片的联合编制工作。1957 年 5 月在文化部召开的图书馆专家座谈会上,他建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与出版局联合起来,采取借用出版局的样书和直接向出版社借用清样的办法,解决北京图书馆卡片不及时的问题,以节省全国各馆人力物力[27]。文化部采纳了董明道和其他专家的相关意见。1958 年 8 月,北京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单位共同组成了图书提要卡片联合编辑组,开始编制发行全国出版新书的铅印卡片。从取样书、著录、分类、印刷直到发行,一般不超过五日,80% 的卡片比书早日到馆。董明道提出的这种用校样本编制目录卡片的方法,大大缩短了新书与读者见面的时间,满足了各馆及时使用卡片的需求[28]。

3 呕心沥血:主持图书馆馆务

3.1 允公允能:主持南开大学图书馆

从 1931 年到 1952 年,董明道主持南开大学图书馆二十余年(其中西南联大八年)。他始终秉持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理念,从征询采纳读者意见、图书馆使用法指导、公开书库制度等多方面着手,积极整顿馆务,谋求发展。

3.1.1 征询采纳读者意见

董明道刚上任,即告诉来访的校刊记者,将来馆内改革当广征同学意见,以符合大多数读者需要[29]。不久又召请校刊记者谈话,征询同学们对图书馆的批评与建议。董明道说:“图书馆既为大家而设,则一切行政自宜以为大家谋最大之利益为宗旨。故欢迎同学对图书馆供献建议。虽图书馆之经费不甚充裕,但在可能范围内必尽力改善。建议之法,或用口头,或用书面。”[30]在图书馆事业不甚发达,大学生对本校图书馆阅览室狭小、书库封闭、图书不敷使用、借阅不便等问题时有抱怨的情况下,有些图书馆无力改善,对批评避之唯恐不及。董明道却在校刊上公开寄语学生,再三广泛征询读者意见,以完善图书馆服务。这种做法在当时极为鲜见,如果不是出于对图书馆工作的无限热爱,如果没有“一切为了读者”的服务精神,是很难做到的。

对和蔼可亲、富有学识和经验的董主任,学生们自然不吝建言,如某教授借书三个半月未交还图书馆、有些书卡片上明明写着却找不着、找书耗费时间[31],不忍心“烦扰”图书馆员[32]。董明道十分重视学生们的意见,迅速采纳及答复:“(a)凡借书已逾两周者,若有人要用,则不论何人皆应按章取回。此乃图书馆素日一律执行之规则。恐同学有疑,再申言之。(b)卡片上之书,寻不见或遗失,多系平日入书库取书将书错放,及书已失,未将卡片取去所致。本馆近正进行重订书目,将来此种事件当可免除。(c)本馆职员人少事繁,未能一一为同学效劳。至一切职内之事当竭力奔赴。”[33]学生们建议的事情较为琐细,如图书馆冬天太热了之类[34],但读者服务无小事,董明道总是尽力解决,用心建设读者满意的图书馆。经过整顿,图书馆的阅览厅座位得以增加,书目得到完善,中英文书籍杂志也添购不少[35]。

图书馆服务经完善之后,学生们更加具备主人翁精神,更加热爱图书馆,主动参与图书馆管理,对馆内抽烟[36]、携杂志离架不签名[37]、《大公报》社评被人剪去[38]等图书馆不文明行为提出批评,呼吁大家遵守图书馆相关规定。董明道也成了同学们信赖的图书馆主任。

3.1.2 注重实用的读者服务

图书馆贵在致用。1930 年,南开大学图书馆除未整理的卢木斋、李典臣赠书外,有中文书籍一万六千余册,西文书籍一万八千余册,杂志三百余种,报纸十余种[39]。至 1934 年 9 月,南开大学图书馆有中文线装书 99,662 册,中外文新书 39,961 册,杂志约 550 余种,已装订成册的杂志 12,000 余册,长订阅的报纸 21 种,经济研究所图书室另有图书 12,151 册,报刊 340 余种[9]。董明道认为,虽然馆藏中文旧书丰富,历年所购的重要参考书和重要的大套杂志也为数不少,但在应用方面仍显不足,当继续努力添置重要图书杂志。“南开大学各科学生每学期所学课程虽不多,但内容却十分充实,每门课并不只是学一种课本,差不多每门功课都要同时阅读七、八种参考书。图书馆对这些参考书总是千方百计购置,每种总要配备七、八本至十数本。”[40]因杂志能够传递最新学术动态,南开大学师生对其尤为重视,视若珍宝。为了满足读者需求,董明道加强对杂志的购置:每年购置杂志的费用约占全部购书费的三分之一有余;国内出版的重要杂志多已齐备;西文杂志则视杂志性质和本校需要,随时选择和订购;以前未曾订阅及丢失的也都补购齐全[9]。董明道“以用为主”的藏书建设理念,为学生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为师生了解学术动态、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基础。

董明道坚持宣传推广图书馆的使用方法,每年都向新生介绍图书馆概况、目录使用法、书码的意义、重要参考书与借阅方法等,并带领参观。同时又精心准备大量习题,由图书馆分发,指导新生熟悉各种使用方法,以便更好地利用图书馆。此外,讲座、参观与实习多措并举,介绍各种重要图书杂志,开展参考咨询服务,对师生教学研究有极大的辅助,提高使用效率。“公开书库制度,使阅者可以就架取书,将一部分普通重要图书,陈列阅览室中,使学生于课余之暇,可以随时浏览;新入藏之图书,在出纳处前,展览一周,并有时在周刊上公布图书之消息。凡此种种,皆本实用之主旨。”[9]1935 年,南开大学图书馆因为办馆成绩卓著,藏书较丰富,市民到馆阅览者也很多,成为天津第一家获得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赠书的图书馆[41]。

3.1.3 参与图书馆重建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即将结束使命,北大、清华和南开复员。复校后,南开大学图书馆设在胜利楼二楼东端的六间教室,阅览室、藏书室、办公室各两间。原有图书早已荡然无存,图书极度匮乏,连校长张伯苓也加入到搜罗图书的行列[26](1157)。作为图书馆主任,董明道更是当仁不让,极力采购补充。至 1947 年 7 月,南开大学图书馆藏书共计 6 万余册,其中新购书刊 37,076 册,昆明运回、联大分发书刊 17,816 册,接收、找回、各方赠送书刊 8,000 册[22](310-313)。

1948 年秋,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代行南开大学校长职务,向工业社团募资修复南开大学原木斋图书馆[42]。同年 9 月,卢木斋先生逝世,子女

遵嘱向南开大学捐赠 1.8516 亿元，用以重建木斋图书馆[43](362)。当时，“教育部拨给南开 1948—1949 年度的预算数额竟然不及 1936—1937 年度南开预算的 20%，区区数目根本无法满足南开修复校园设施的基本需求”[44]。经费如此紧张，恢复、重建已属不易，购书更是困难。董明道和他主持的南开大学图书馆，一方面坚持采购图书，一方面通过接受颜惠庆、徐鹤桥、周叔弢等社会贤达赠书，与前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基本图书馆等建立书刊交换关系，充实馆藏。1951 年秋，南开大学图书馆重建竣工，重建后的南开大学图书馆建筑面积为 3,034 平方米，工作人员 16 人，藏书达 20 余万册[43](362-364)。1952 年董明道离任之际，南开大学图书馆已恢复旧观，在废墟上重新崛起。

3.2 刚毅坚卓：任职西南联大图书馆

董明道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了八年多，以刚毅坚卓之品格，为保存中华民族文脉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 年 9 月，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下文简称“长沙临大”）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合作，设立大学图书馆；又借用湖南省建设厅国货陈列馆图书室，作为第二阅览室。北大、清华、南开的图书均未运湘，一切须重新购置。长沙临大购书侧重于教学使用的参考书和教科书，短短三个月购得中文书 5,275 册，西文书 1,288 册，中文期刊 49 种，受赠图书 247 种[45](280-286)。此时，人员多未能赶到，董明道作为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唯一职员，参与了长沙临大图书馆的建设工作。

1938 年初，长沙临大决定西迁昆明。4 月，因校舍面积不足，西南联大设理工学院于昆明，设文法学院于蒙自。董明道担任蒙自分校图书委员会委员[46]，兼理馆务。12 月，董明道担任西南联大图书馆副主任，襄助图书馆主任严文郁办理馆务。在教务处、图书设计委员会的领导下，二人珠联璧合，综理总馆、分校及学院分馆、系图书室事务，组织图书搬迁、疏散、抢救等工作，制订合理的规章制度，千方百计搜集图书资料，为联大师生提供便利。

1943 年 2 月，董明道接任图书馆主任，继续推进馆务发展。首先，他主持编印了《西南联大图书馆阅读指南》，修订阅览规则，延长阅览时间。大阅览室每日自上午八时至晚上十时（后调整为上午七时半至晚上九时半），连续开放 14 个小时[45](308-314)。中午和晚饭时间不再闭馆，减少了学生排队抢座的频次，尽量满足师生利用图书馆的需求。其次，调整图书馆组织结构，增设图书影片股、参考股和典藏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滇缅路被敌人封锁，西文书刊无法寄来。英美为援助我国科学文化建设，将本国近两年出版的期刊陆续摄成影片，赠送我国教育部。1943 年初，教育部为接收此项资料并分赠各文化中心及大学，于重庆成立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昆明方面，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委托西南联大图书馆办理图书影片借阅事宜。联大图书馆成立图书影片股，于校内辟影片阅览室四间，放映影片，供师生研读；于昆明各机关团体设流通处，由联大图书馆管制，分借及交换影片[47]。在新出西文期刊奇缺的情况下，图书影片无疑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另外，董明道还增设参考股，由专人负责参考咨询工作，更专业地答复读者咨询，更全面地搜集、整理、保管参考资料。当时物力维艰，且客观环境难以改变，董明道勉力维持图书馆应有的各项服务，在可能的范围内谋求最好的效果。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后，董明道作为西南联大图书迁运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迁校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三校复员北返工作。董明道与三校联合迁移委员会一起，主持图书清点、装箱、登记、运输、移交等工作。联大图书馆除迁运本馆 48,000 余册图书外，还要负责各系迁校后开学不急需的缓运图书、个人托学校代运的部分图书、北平图书馆借与该馆的西文书刊等装箱迁运工作。此外，联大图书馆把复员后易购置的图书留置昆明，董明道作为移交人，负责移交事宜[45](333-390)。三校迁运复员工作任务巨大，董明道终不辱使命。

西南联大图书馆经费支绌，采购极度艰难，馆务极其繁重，人事比较复杂，所以董明道等同人抗

战期间“遭遇困难最多,吃的苦头自然不少”[48]。1942年4月,严文郁因入不敷出,生活无法维持,迫不得已提出辞职,学校慰留[5](228)。董明道上有老母需要供养,下有五女需要抚育,夫人只得自谋生财之道,开设食堂以维持生计[49]。严文郁、董明道共克时艰,悉心经营,使西南联大图书馆“于此狂风暴雨之中,诞生,洗炼,茁壮”。馆舍“虽属质朴,而宏敞可喜”。书籍经多渠道购置,三校提供,社会捐赠,北平图书馆、中央研究院与云南大学等借用,加之印刷讲义,“虽不称丰,亦庆小康”,可勉敷师生教学科研之用[50]。

4 结语

董明道是我国20世纪“新图书馆运动”的中坚力量,是第二代图书馆学人中勤勉实干的典型代表。从读者质询不断到师生交口称赞,从日寇炸毁劫掠到废墟上重建的南开大学图书馆;在战火纷飞和流离迁徙中诞生成长,为300余名教授和8,000名学生提供文献资源保障的西南联大图书馆;为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需要,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矿业学院图书馆。这些图书馆的蓬勃发展,都凝聚着董明道的心血,他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追寻董明道为图书馆事业奋斗的足迹,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彰显了“智慧与服务”的文华精神,“允公允能”的南开精神,“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董明道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他的图书馆精神,即爱国精神、实干精神、专业精神、服务精神。爱国精神:抗战时期,饥饿与轰炸频频来袭,他依然选择坚守,殚精竭虑,为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教育奉献心力。实干精神:他忠诚和热爱图书馆事业,一心为公,终日忙于馆务,默默奉献。专业精神:他受过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并学以致用,以专业精神支撑图书馆管理。服务精神:他加强与读者的沟通,了解读者需求,扩充馆藏,编制目录,提升服务水平,把读者服务作为图书馆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终极意义[51]。总结他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继承和发扬图书馆事业与学术,弘扬图书馆精神,爱国、爱馆、爱人、爱书[52]。

参考文献

1 韦庆媛,邓景康.清华大学图书馆百年图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49.
2 杨家骆.图书年鉴(上册)[M].3版.南京:中国图书大辞典编辑馆,1933:266.
3 董明道先生北上赴平[J].学风,1931(7):33.
4 图书馆主任履新[J].南开大学周刊,1931(119):35-36.
5 北京大学,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6 邬淑珍.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史:1909—2009[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9.
7 王子舟.1957年图书馆界右派的言论及遭遇[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5(2):72-83.
8 时论撮要:图书馆学:图书选择原理略说(董明道)[J].图书馆学季刊,1931(2):318.
9 董明道.今日之南大图书馆[J].南大半月刊,1934(15):1-10.
10 西班牙国立图书馆[J].董明道,译.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1935(3/4):462-469.
11 董明道.图书馆的任务[J].学风,1930(1):11-13.
12 董明道.儿童图书馆在教育上之价值[J].安徽教育行政周刊,1929(25):1-5.
13 董明道.现代公共图书馆之特征[J].安徽省立图书馆季刊,1929(2):1-7.
14 杜定友.儿童图书馆问题[J].教育杂志,1926(4):1-15.
15 董明道.最简单的儿童图书馆之经营法[J].安徽教育行政周刊,1929(26):1-6.
16 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M].上海:中华书局,1934:54.
17 董明道.图书出纳法略说[J].学风,1930(3):3-8.
18 董明道.图书选择原理略说[J].学风,1931

(5):3-6.
19 省立一职开办图书馆班[J]. 学风, 1930(1):22.
20 省立图书馆专班情形[J]. 学风, 1930(2):26.
21 省立一职图书馆专班毕业介绍[J]. 学风, 1931(8):30-32.
22 王文俊, 等. 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G].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23 北京大学, 等.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299.
24 董明道. 本馆编目法及其说明[J]. 安徽省立图书馆季刊,1929(1):1-19.
25 安徽省立图书馆. 安徽省立图书馆中文书目[M]. 安庆:安徽省立图书馆,1930-1932.
26 梁吉生, 张兰普. 张伯苓私档全宗[M].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
27 文津. 图书馆事业上存在的矛盾问题:文化部召开的图书馆专家座谈会记要[J]. 图书馆工作,1957(7):9-15.
28 丁郁. 图书提要卡片联合编辑组工作情况介绍[J]. 图书馆工作,1959(3):42-43.
29 访问新图书馆主任记[J]. 南开大学周刊, 1931(120):54.
30 与董图书馆主任谈话记[J]. 南大周刊副刊, 1932(5):15-16.
31 华. 我也来谈谈图书馆[J]. 南大副刊,1933(25):7-8.
32 旧人. 杂谈图书馆[J]. 南大副刊,1933(24):2-3.
33 公开答复[J]. 南大副刊,1933(26):5.
34 文. 大批建议:写在除夕的夜里[J]. 南大副刊,1935(53):1-4.
35 闲话[J]. 南大副刊,1934(50):21-22.
36 喷云吐雾[J]. 南大周刊副刊, 1932(10):15-16.
37 图书馆杂志集中—防盗—[J]. 南大副刊, 1934(51):19-20.
38 耻! 耻! 破坏公物[J]. 南大副刊, 1935(53):20.
39 天津南开大学. 向导[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30:57-58.
40 王淑贵. 早年南开大学图书馆的读书运动[J]. 津图学刊,1997(1):131-133.
41 南大图书馆增添书籍千余种[J]. 天津市市立通俗图书馆月刊,1935(7/8/9):24-25.
42 何廉. 何廉回忆录[M]. 朱佑慈, 等, 译.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300.
43 天津市图书馆志编修委员会. 天津市图书馆志[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44 王昊. 薪火相传 南开的学人与学术研究[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62.
45 北京大学, 等.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六:经费、校舍、设备卷[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46 北京大学, 等.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总览卷[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68-169.
47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概况[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4(5/6):2-4.
48 严文郁. 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纪实[G]//严文郁先生八秩华诞庆祝委员会. 严文郁先生图书馆学论文集. 台北:辅仁大学图书馆学系,1983:1-11.
49 郑天挺.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18:533.
50 严文郁. 抗战四年来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2(3/4):4-7.
51 程焕文, 王蕾. 21世纪高校图书馆管理的新理念[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03(2):15-21.
52 程焕文. 图书馆人与图书馆精神[J]. 中国图书馆学报,1992(2):35-42.

(刘瑞忍 馆员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收稿日期:2019-03-07